

政治常識與社會問題

祝百英等著

行刊科三第府政縣城豐

刊叢研究學保城豐

編主之悌鍾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初版

豐城保學研
究叢刊之二

政治常識與社會問題

祝百英等
鍾悌之

豐城縣政府第三科

非賣品

主 著

行 者 編 者

豐城利豐和書紙印刷局

印 刷 者

豐城保學
研究叢書

政治常識與社會問題目錄

一、當前的政治形勢與政治動員

二、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

三、政治常識

四、國際政治經濟之研究

五、社會問題概論

當前的政治形勢與政治動員

鄧初民

當前政治形勢的特點，可以說是從很嚴重的民族危機中，達到了一個新的轉變點。一言以蔽之，就是從過去的內戰，獨裁、不抗戰，達到了和平、民主、抗戰的新的轉變。

不過我們要說明這一新的轉變偉大的歷史過程，至少我們要從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說起。換言之，即我們要說明當前，對於過去不能不有一個簡單的回溯。

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所給與我們的革命使命，對外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對內是剷除一切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這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殖民地與人民大眾的對立，是主要的對立。所謂民族與民主革命，簡言之，即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不幸這一革命，中經革命勢力之分裂，反帝反封建的任務，一間沒有完成。又不幸『九一八』的民族大慘變，突然爆發，把中國命運淪於生與死，存與亡的十字街頭。使得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能不適應着當前具體的政治形勢，而變爲抗日與反漢奸的革命。因爲『次九一八』以後，即刻變更了國際國內的形勢，一方面日帝國主義與中國對立，成了主要的對立，暫時把中國與其他帝國主義的對立壓低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時，日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的對立，也成了主要的對立，暫時把國內各種社會階層的對立也壓低到了次要的地位。換言之，即是民族對立，壓低了階級對立。

但，抗日反漢奸的革命，並不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相衝突。它祇是革命戰術的變更，並不是革命策略的變更。在抗日反漢奸這一革命戰術之下，在抗日第一主義之下，便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爲當前政治實踐的總的路線。

這一民族統一戰線，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民十五北伐的勝利，可以說是由於統一戰線的建立，其失敗恰恰是由於統一戰線的破裂。然而這一民族統一戰線，却也不是舊的東西。它有它新的姿態。它的範圍是擴大了。它包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做漢奸的人，牠把一切都放在對外的基點上，因而牠與中國過去的統一戰線不同，也與現在西班牙，法蘭西的人民陣線不同；但牠却與世界上的和平陣線有着緊密的聯繫，牠決不是孤立的。

這樣一條總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牠的產生，雖然是由於中國客觀實踐的要求，但客觀實踐要求的東西。並不就是自然生長的東西，牠還需要人的努力需要種種社會條件。其最主要的社會條件，可以說一是國內的和平統一，一是國內的民主自由，而最後目標，則為完成我國一致的對日抗戰，從和平到民主，從民主到抗戰，這是「九一八」以後的客觀形勢所給與我們的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

然而這一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却不是「九一八」慘變一開始，就有人提出來的。實在說，「九一八」的開頭幾年，中國所執行的却是與新的政治路線，新的確定步驟正相反對的政策。例如我們要求的是精誠團結，和平統一；而那時（日寇已佔了東北四省還向我一步一步進攻不止的時候）却仍在努力剿匪，進行內戰。我們所要求的是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實現民主政治，而那時却仍在壓迫愛國運動，限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一切自由，幻想造成個人獨裁。我們所要求的是舉國一致對日抗戰，而那時却堅持着不抵抗主義。一句話，我們所要求的是和平，民主，抗戰，而那時所行的政策，却是內戰，獨裁，不抵抗。

從內戰，獨裁，不抵抗到和平、民主、抗戰的轉變，是需要一番鬥爭的，需要人的努力的。這一努力差不多在「九一八」以後的三年——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方開始。那時首先就由大眾迫切的要求，提出了組織抗戰的總的政治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同時，就開始爭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第一個社會條件，就是爭取國內的和平統一，所以「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精誠團結，和平統一」等口號的喊出，都是這一工作的實際表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以說就是爭取國內和平統一初步的成功。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在歷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起了偉大的歷史轉變，承上啓下的樞紐。她使我們馬上展開第二步工作，馬上從爭取國內和平統一運動轉到爭取國內民主自由運動，馬上從很嚴重的民族危機達到一個新的轉變點。而在中國歷史從內戰，獨裁，不抵抗到和平，民主，抗戰的轉變上，以很鮮明的筆跡刻劃了一塊永不滅磨的界碑。此後中國政治展開了一種新形勢，牠開始由和平統一向民主抗戰之途邁進。和平——民主——抗戰，這是新的政治形勢所給與我們的新努力步驟。這一步驟賴人是決

不允許我們從容完成的。果然牠在我們正集中力量，於國內和平統一有了相當基礎之後，爭取國內的民主、自由，一面藉以鞏固和平統一，一面藉以充實抗戰力量發動舉國一致抗戰時，便爆發了蘆溝橋事件，而且佔領我們的平津了，這樣，他就破壞了我們準備抗戰的步驟，我們也就祇有立即抗戰。抗戰！抗戰！一千一百個抗戰！這樣就縮短了我們組織抗戰，推動抗戰，實現抗戰的步驟，把我們抗戰提前了一步，我們決不能說要等國內民主自由澈底實現之後，才能抗戰。更不能把和平——民主——抗戰的步驟看做機械的。我們並且要澈底認識祇有在抗戰過程中，和平統一與民主政治，才能澈底完成與實現。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句話，本來就包含惟有『戰』，才能『統一』的意義。

抗戰已開始了，我們祇有立即總動員。在總動員中包含各種的動員——政治的動員，經濟的動員，軍事的動員，文化的動員，然而在各種動員的組織過程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莫過於政治動員的組織過程。

政治動員是各種動員的『摩托』，如果政治動員的組織過程不能全，不堅實，不強

有力，雖然你有最完備的軍事組織，最優勢的經濟勢力，最前進的文化水準甚至於最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抗敵情緒，都將不能好好地發揮出牠的力量來。

因此政治動員，成了我們總動員中，亦即成了我們同日帝國主義決最後生死的抗戰中一個頗值得注意的問題，總動員的前途如何？政治動員是其決定者。甚至於抗戰最後的成功與失敗，亦決定於當前的政治動員。

然則政治動員的中心任務在那裏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權機構或政治組織的健全，堅定，強化。所謂政權機構或政治組織的健全，堅定，強化，就是要使政治的『摩天』在各方面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上，如在經濟，軍事，文化，民衆各方面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上，都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極度的靈活，極度的敏捷。

那麼，我們就祇有在各方面推進加強政府中樞，政權機構的工作。

第一，我們要使國內的各黨各派，不分左右，不分大小，一個也不遺漏的統一在政府中樞之下。

第二，我們要使國內的軍政當局，地方當局，亦即國內過去不免對立的各實力派，一個也無例外的統一在政府中樞之下。

第三，我們要使國內各階層的民衆，各職業界的民衆，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漢滿蒙回藏，一個一個都忠實赤誠團結在政府中樞的周圍。

這就是說加強政府中樞，其向心力的因素，不僅限於政府本身的直接組成者，同時還要使廣大的民衆擁護牠。也就是說政治健全，堅實，強化的過程，不僅限於政權機構的一部分，還要及於全部的政治組織，即把政治組織過程，推廣到一般社會組織及人民意識的組織過程。

但是政治組織的強化，並不就是政府中樞的獨裁。恰恰相反，而是要在政治組織的本身包含最大最廣的民主性。所謂政治組織本身的民主性，就是將政權極度公開，就是把抗日救亡運動，甚至直接的抗戰組織，開放給全中國人民，乃至於全中國優秀的兒女們，把抗日救亡的各種自由——言論，思想，出版，信仰，集會，結社各種民主自由，交給全中國人民，乃至於全中國優秀的兒女們，使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共同討論的機會，

各種不同的問題有共同解決的機會，使全國人民的公意都有直接訴之於政府中樞的機會。這樣，政府中樞所執行的才是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各種職業界，乃至全國人民的公意，由是政府才變成全國人的政府，才能得到全國人的擁護，才能強有力的去執行抗戰，才能強有力的去動員各方面起來抗戰，才能在總動員的過程中去強有力的指揮、調度、支配、操縱一切。

譬如，說在目前直接走向抗戰，立即發動舉國一致的抗戰，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政府中樞即以抗戰的具體表現昭示國人，則各黨各派各階層的民衆，自然相信政府，擁護政府，（過去割據的封建軍閥，亦失却反對中央的口實，）在抗戰的過程中，要求抗日救亡以至直接抗戰組織之各種自由，尤其是抗戰過程中的極度民主性是。全國人民的公意，政府中樞即以各種自由交給他們，則各黨各派各階層民衆，自然祇有對於政府的信仰加深，對於政府的擁護加強。決沒有一個喪心病狂的人還在這樣的政府中樞領導之下搗亂。過去一方面用一切方法壓迫「衆愛國運動」，壓迫其他黨派的抗日活動；而另一方面想在政府或政府黨的包辦之下來『統一救國運動』。其方法是愚蠢，其結果是失敗，

已有充分的事實得到證明。

所以在總動員中，政治動員是最基本的，在政治動員中，政治組織的強化，是最中心的任務，而政治組織的強化並不是政府中樞的獨裁，倒是政治組織本身的民主化，所以爭取民主自由，成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要條件之一；同時，也是實現抗戰政治動員的主要條件之一。在和平——民主——抗戰一系列的步驟中，日寇不讓我們從容完成爭取民主這一步驟就發動了牠的侵略戰爭——就爆發了盧溝橋事件，而且佔領了我們的平津，我們只有在抗戰的過程中來完成牠，只有在政治動員中來完成牠。

西安事變以後，各黨派的合作談判已在日益進展，這可以說是政府中樞民主性之最大表現，也可以說從那時起已開始了政治動員，已完成了政治動員的主要部分，也即是說各黨各派已開始統一於中樞政府之下了。

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中央雖亦曾幻想於委曲求全之中得到與日寇暫時妥協的和平，然而平津失陷，已超出了任何人可以容忍的境界，尤其是把蔣委員長廬山第二次談話所提示的四原則破壞無餘，我中樞乃亦不得不從準備抗戰時期走入立卽對日抗戰的偉大

時期。因此，各地方當局，各地方軍政領袖——如閻錫山，余漢謀，何成濬，白崇禧，黃旭初，劉湘，何鍵，龍雲諸氏，都紛紛入京。這在抗戰聲勢擴大之有力的表現，尤其是中樞政府加強，政治組織強化之有力的表現，亦即政治動員之具體的實質的表現。這種表現當然更以廣西領袖之入京為最尖銳最明朗。這樣，各地方當局也無例外的統一在中樞政府之下了。

再則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全國民衆即風起雲湧組織抗敵後援會，發起募捐，慰勞，宣傳，組織等運動，亦即開始各種動員準備，而各種動員準備，差不多以京滬武漢等處為最熱烈，這是把各種抗日救亡的民主自由開放給全國人民之具體的表現，亦即政治民主化之具體的表現。最值得注意的，還有政治犯釋放及其通緝令之取消等。現在救亡七領袖是已出獄了，久被通緝的郭沫若已取消息通緝，並已從日帝國主義的領土回到『諸暨』了，（郭最近作詩有『願將殘骨埋諸夏』之句）。這尤是政治民主化之最具體的表現，尤其是政府動員之最有力的表現。這也將會使全國民衆都忠實赤誠地團結在政府中樞周圍。

這樣，最基本的政治動員就可以完成了。政治動員的完成，同時，就是總動員的完成，我們總動員起來去同日帝國主義拚命！我們一定要戰勝日帝國主義！我們也可能戰勝日帝國主義！

可是我們的政治動員，也不一定就是這樣順利的，這樣的政動員，一定要受到漢奸，親日派，以及一切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警犬們的破壞，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總動員中，集中力量爭取政治動員，在政治動員中集中力量爭取政治的民主性，即我們要在抗戰的過程中來完成民主運動。

軍事勝利的基礎在政治

錢俊瑞

從這次上海的戰事掀起了我們全線的抗戰以後，我們的飛機在不斷的施展神威，我們把上海的敵人打得個落花流水，同時東北方，我們又把商都和張北次第收復了，我們的大軍正在向察北和熱河挺進，做進一步收復我們整個失地的準備。

這些能告訴我們些什麼？這些軍事上的勝利首先告訴我們：我們過去唯武器論的恐日病者是整個的破產了，——我們的步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騎兵是能打仗的，我們的砲兵也是能打仗的。而我們的空軍更加能夠打仗。他們不但能打仗，而且能打勝仗，能殲滅敵人。

於是，恐日病患者絕跡了，這實在是一件應該慶幸的事。然而不幸的，在另外一個極端却在蔓延着一種新的病症。這種病叫做『唯軍事論的虛矯病』。害這種病的人看到我們在軍事上有局部的勝利，便拍拍胸膛大喊道：『你看，只要我們有好的軍隊，有好的軍事佈置，不是我們就能打勝仗嗎？今天我們只要槍桿，只要飛機，別的便什麼都

不要。」這些好漢們在表面上雖然和唯武器的恐日病者相反，然而在根本上他們和恐日病者有一個共同的錯誤。他們都以為中國對敵人的抗戰完全是由武力來決定的。恐日病在看到自己武力不如人，所以就害怕敵人；虛驕病在看到自己的武力可以打勝仗，所以就以為單憑我們的軍隊就可以制勝敵人。

這實在都是大錯特錯。我們應當老實指出，我們如果要用單純的軍事力量；擊毀日本帝國主義，那末我們不但沒有必勝的把握，我們終於會失敗的。我們要問：阿比西尼亞，對於意大利的抗戰為什麼會失敗？我們說，這主要是因為阿皇並沒有真正的解放民衆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而決不是意大利毒氣的過於厲害。我們再問：蘇聯革命以後為什麼能夠用殘破的物力和粗劣的武器，把各帝國主義的總合干涉軍隊全部驅逐出境？為什麼一九二六年十二七年我們的國民革命軍能夠擣蕩雄厚的軍閥，完成勝利的北伐？我們的回答是：這主要是因為自己政治的組織超過敵人，軍事力量和民衆力量完全打成一片的緣故。

老實說，今天我們中國要制勝日本帝國主義是有充分的把握的，然而這把握不僅在

軍事，而也在政治。我們不必隱諱，我們軍事上的物質設備，的確確敵不過日本，因此從積極方面說，今天我們軍事上小小勝利，還不過是我們全面勝利的起點；而從消極方面說，如果我們以這些軍事上的勝利為滿足，而不去開發我們真正可以制勝敵人的園地，——政治的園地，那末就會因為我們的虛驕而遭到慘敗。

我們可以不必隱諱的說，今天我們的政治的準備是遠遠的落在軍事的佈置之後，所以我們的軍事行動愈挺進，便覺得我們的政治工作愈不夠。同時，正因為政治工作的做得不夠，軍事的挺進就變得緩慢了，軍事上局部的勝利就變得沒有堅實的基礎了。所以我們在今天要大聲疾呼，我們不要把我們的注意局限於純粹的軍事行動吧，我們要把大部份的力量集中到政治的民衆的工作上去。

具體點說，在對外關係方面，我們應當憑着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堅決抗戰，團集全世界的友邦到我們的週圍來，我們尤其應當設法增進跟蘇聯的友誼，立即締結中蘇互助公約，保障我們可能從國際方面取得雄厚的奧援。

在國內，我們應該在經濟上採取一切必要的措置，使人民的生活不至於因為抗戰而

完全落空；應該用政府的力量制止工商業的無故停業；應該遵照一定的計劃，獎勵國防的生產，這樣一方面可以消納大批失業的工人，一方面可以使廣大的勞動力，獻給保衛祖國的神聖事業，應該使全國的企業家明瞭，把他們平常所得到的利潤分出一部份來，維持職工大眾最低限度的生活，使他們能夠為整個民族的解放而出力，這是他們今天最光榮的任務。

特別重要的，政府和上層的金融業家和工商業家，在今天必須用完全民主的精神：

把各階層的民衆，都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更進一步武裝起來，使他們能夠到前方去效力，或者留在後方做一切急要的抗戰後援工作。政府和金融產業家們今天所有的是雄厚的物質力量，而一切民衆團體所有的却只是人的力量。在今天當我們向敵人肉搏把敵人殲滅的時候，我們單有物質的力量是決不夠的，我們必須把廣大的人力和雄厚的物力配合起來，然後可以供應前方和後方一切的需要。如果在今天，政府當局金融工商業家，只知道憑着一部份物質的力量，資助單純的軍事行動，那末這種軍事行動的開展決不能有堅實的前途，而全國絕大多數的民衆在抗戰期內只能做袖手旁觀的清客，和坐待犧牲。

的綿羊。這樣來求抗戰的勝利，那真是緣木求魚，而我們的失敗是必然的了。

站在愛國民衆的立場，全國至少有四萬萬的同胞，在張開着雙手，向政府要求把各種各樣的抗敵後援的工作分配給他們做。他們今天寧願犧牲一切，不要錢，不要命，為祖國的獨立解放而奮鬥，而拚命，他們今天痛感着組織饑餓，尤其是工作的饑餓，和武裝的饑餓。如果我們在這時候，還不能澈底開放民衆的組織，開放民衆的運動，只想用兩百萬僱傭的軍隊來和敵人決鬥，那末我們的前途可以說是非常慘淡的。

我們今天至少只能說已經發動了全線的抗戰，我們還沒有做到全面的抗戰，因為在軍事上我們固然是抗戰了，我們在政治方面的工作。還是差得遠。我們今天必須認清，政治上的動員是我們勝利的基礎，假如我們要用單純的軍事行動來包辦抗戰，完成抗戰，那是我們自己踏上失敗的道路。阿比西尼亞的慘敗已經警告我們不能再那麼做了。

政治常識

祝自英

我們在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的時候，時常提起政治問題。研究各種社會現象，有各別的社會科學。而這政治現象也是社會現象的一種，自然也該有一種專門的科學去單獨研究它。

政治通常多是當作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或治理人的東西。這是不合事實的說法。國家這一東西，根本就不是有人類社會存在以來就存在的。而這所謂治理社會或人則，並不一定需要「政治」的方法。人是隨時隨地被各種經濟，習俗，道德，「民事」性的社會規律所「治理」的；整個人類或整個社會，也並不是必須用政治的方式來治理的。「治理」工廠，「治理」莊園，就內各種技術，經濟規例去實行的。在原始社會的時候，社會的治理就是直接的經濟行為，根本無所謂政治。政治祇是人類社會上，從某一階段開始存在的現象。

在社會上發生了經濟不平等現象之後，社會上人們變互相對立。因為有這對立，纔

發生互相抵觸。基礎於這種經濟現象而集中地表現這種經濟現象的形式，就是政治。如果社會經濟沒有不平等的現象，則經濟的管理，直接就是社會的管理，就根本不需要這種表現經濟而有別的經濟的形式。人們既然在經濟上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一部分人想以他們的利益，強制的作為全社會人的利益，政治的系統纔由此產生。政黨，國家，政府，戰爭，都是政治的現象。人類社會雖是繼續長存，而國家卻是有歷史上的起點，並且將有歷史上的終點。

有人將一切政權，政府，政黨，政治鬥爭，都歸納在國家之內，這是機械主義的統括方法，將牠們的區別混雜，關係含混。這種說法的最錯誤的地方就是以國家為基礎，將政權，政府，政黨，政鬥，當作是由國家循序產生出來的東西。這似乎是在說先有國家，後有政權，再後有政府等等。其實這是武斷鷄與蛋誰先誰後的辦法。

一、階級問題

關於各種政治現象，其重要的地方不是先後問題，而是基礎問題。

政治既是經濟的一種表現形式，牠當然以經濟為基礎。然而單由這一關係來說明

政治，是不夠的。政治在直接根據經濟的條件下，自有牠一貫的規律。透這規律的一定有確定的根據。階級就是這種根據，就是一切政治現象所通有的根據。

人們在經濟生活中，既然發生不平等的現象，則社會就分為幾種「人的集團」。我們已經知道，人類社會的特點是生產。就在這生產過程中，人們對於生產工具與條件所發生的不同關係，造成人們經濟地位的不平等。這就形成不同的階級。佔有機器，工廠的人屬於資本階級；沒有任何生產工具替人操勞的人，就屬於勞動階級。

職業不同，收入多少，身分高低，地位上下，男女性別，年齡長幼，一切這類的區別，都不是階級的基礎。階級的基礎是在生產。

有人否認階級的存在。其實這是沒有意義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否否認可以瞭解的。「否認」不是「研究」的態度。近來有人主張不作階級鬥爭。可是就根據這一點，反可以證明階級的存在，否則何來「主張」與「不主張」呢？

事實正好相反，社會的階級，即人們對於生產工具所有的關係之不同，任你叫牠什麼名詞，終久是存在的。

階級既已存在就是等於說，他們的矛盾是存在的。所以在階級存在的最初一天，就存有了階級鬥爭。在這種鬥爭還是自發的時候，階級就稱爲「自在的階級」。等到了階級有了覺悟，闡發覺悟的行動的時候，階級就成爲自爲的階級。在法蘭西大革命的時候，第三等級反對貴族及地主，而在第三等級內，已經勞動階級的存在；不過他們並不能夠爲自己而奮鬥，而是盲目的跟人奔走，所以有「自在的階級」。勞動者們搗毀機器的行爲，也是表明階級自帶「自在」的性質。

階級鬥爭的種類雖多，總括起來，可以劃分爲三種：一、思想鬥爭；二、經濟鬥爭；三、政治鬥爭。社會上一部分人對社會不平等的現象，起而作理論上的爭論這就是思想鬥爭；如各種思潮的衝突，就是例子。人們又因爲不滿意於自己的經濟生活，而作改良物質待遇等等的鬥爭，就是經濟鬥爭。如果鬥爭是關係政權的，那就就是政治鬥爭。不過一切思想，經濟，政治鬥爭，如果說不是社會性的，那一定是階級鬥爭的表現。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衝突，是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增加工資或關閉工廠的行爲，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勞動者奪取政權，或資本家壓制這種奪取更是階級的行爲。

級鬥爭。因為階級在社會上不能兩立的集團，所以一切形式的爭鬥，不是企圖維持現社會現政權，便是消滅現社會現政權，結果，牠們都是政治性的鬥爭。

社會上雖然不僅有兩個階級，可是基本的總祇有兩個階級。其餘的階級祇能算是中間的或過渡的階層。在兩個基本階級鬥爭的時候，所謂中間或過渡階級終久是依附於一方的。甚至於所謂中立在客觀上也是帶有向甲方怠工，對乙方示好之意義。真正的中立是沒有的。

在階級衝突直接採取政治形式的時候，問題就關係到社會形式的存亡。在現代社會中這政治衝突所取的形式是很多很多。國會的鬥爭是政治鬥爭的一種形式。在一個階級還沒有能夠或不願意推翻現有政權以前，議會鬥爭是重要的工具。但是經過議會，決不能建立新的政權的。如果政治鬥爭的直接目的是在拿取政權，那就叫「革命」。革命就不是單純的行動。要想對存在的政權革命則已握政權者必然要起而抵抗，必然要以軍警力量起而彈壓剿伐。因此在企圖取得政權者方面，也就得使用武力作為對抗。這是形成所謂武裝鬥爭。

不管這類思想鬥爭，經濟鬥爭，政治鬥爭——議會鬥爭，政權鬥爭，武裝鬥爭，究竟是社會之幸或是不幸，他們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階級合作的主張往往是較弱的一方對手方的勢力，以便實施對於對手方的壓迫。所以有人覺得階級合作是一個階級向另一階級進行鬥爭的方法，這話是很確切的。兩個冤家狹路相逢，其中一個見另一個來勢洶洶，自己抵禦不住，就叫聲停住，不要廝打，這並不是他真的不要打死冤家，而是叫人不要打死他，以便他去打死人家。

一一 政黨

階級鬥爭既是這樣複雜的問題，則鬥爭的進行，當然不是一回單純的事。階級雖然是經濟條件類同的人們，可是他們中間未始沒有差別。同是工廠裏作工的人，因為有的是來自農村，有的是出身商賈，有的自幼做工，則對於階級意識，生活，能力等等都有不同。合這許多人而舉行奮鬥，就需要領袖。政黨就是階級中最覺悟最勇敢的分子的集團。牠不僅能代表一個階級，而且領導一個階級。政黨是階級的司令部。

不過這並不是說，一個黨內祇有他所代表的階級的分子。資產階級政黨的黨員不

定是資本家。尤其是因為政黨是階級的覺悟的代表，牠的成員往往有許多所謂知識分子。有知識的人道階級利家的所在，維持本階級利益的手段、以及實行鬥爭的方法等等。

所以根據黨員的成分來斷定政黨的性質是很不妥當的事。不過一個甲階級的政黨，決不會多由乙階級分子所組成的。這裏祇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政黨的真正成員，以及由政黨所僱用的一種專門助手。有許多政黨往往需要所謂「打手」，如希脫勒的武裝隊伍。上層的階級自己總是不肯輕易犧牲生命，而「打手」却是必要的東西。這種「打手」，自然只好由貧窮者充當。這些人自然也算希黨黨員，其人數也許很多。但是我們決不能由此斷定希黨的階級性。

除這些「助手」以外的政黨，是階級的領導。要真正能夠代表一個階級實行領導鬥爭，就需要一貫的意識與行動。所以政黨一定有主義作為信仰，有政綱作為行動的指標，有戰術以佈置敵我的力量有政策指明對於各種問題解決的方案，運用策略以實際行動，提出口號作為號召。這些主義、綱領、戰術、政策、策略，口號，是有一貫的系統，不是杜撰的。單就口號來說，牠必須是階級要求的最「簡潔老到」的表現。譬如從前俄

國在一九一七年所提出的「土地，麵包，和平」的口號，的確可以是說口號的標本。這六個字將農人，工人，兵士及一般厭戰的人們的要求，說得淋漓盡致，字字打入人們的心坎裏去。確定口號尚且這樣煩難，何況其他問題。

而政黨的質質，牠的階級性，卻就是表現在這些主義，綱領，戰術……以至口號上。面對政黨的判斷，也祇有以他們作為根據、

但是在這裏，人們可以發出一個疑問。我們不是時常看見一個階級有兩個政黨來代表嗎？如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與自由黨，德國的國權黨中央黨人民黨，日本的政友會，民政黨等等。問題是這樣的，一個階級多是不很純粹，而且是很不一致的。在近代社會中，資本階級內部是包含着幾個集團。他們對敵對階級雖是一致，而自身卻很有衝突。幾個政黨代表一個階級，是表明他們代表一個階級內幾個集團。祇有統一的階級纔由一個政黨來代表。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說，政黨雖是一個覺悟勇敢分子的緊密集團，而黨政黨員的能力經驗，卻並不相同。政黨為要真能領導階級的奮鬥，自然需要嚴密的組織與紀律在這組

織上，因為各個黨員的能力經驗關係，就有領袖與通常黨員的區別。這一區別，既不是階級的區別，又不是經濟，社會，等等的區別，而完全是認識與能力的區別。如果階級的利益是由政黨來代表，則政黨的認識與能力，就密集的體現在領袖身上。如果政黨脫離階級，就不能發揮其力量，則領袖沒有通常成員，就得不到認識經驗，更不能有所舉動。

幾個階級的人們聯合在一起，就不能算是一個政黨，祇能算是一種聯合。聯合祇是暫時的過渡性的，終久要破裂的。

二 國 家

有許多學者，認為國家是超乎階級，協調階級的體系。其中有人以為「國家是神所創造的，神爲了支配國家，就派遣『天子』來代理」或者說，「上天派教主來治理人類的精神，派國王來管理人們的肉體。」這都是企圖將國家說成神物。「朕即國家，」是企圖將國家說成是帝皇的事業。民權國家，是說國家是人民共有的。這些國家學說，雖將國家歸諸各種不同的「神」，「王」，「全民」，而其將國家當作超乎階級，是共同

的主張。這種見解是不會正確的。社會既有階級，階級既相對立，則國家的性質，政權的支配，決不會是「合股共有」的公司。國家必然走階級統制階級的系統。

講到這裏，我們必須要說明，在中文上，國家兩字往往不是代表而是指

（國土），（民族）或（人民）。譬如「我國地大物博」，是指

；四萬萬人之我國，是指人民；國家主義是指等等。本文內所說的

國家是指，牠是指政權，政府，軍隊；警察，監獄，以及文化系統等等的總體，即階級統制階級的系統。

階級之所以要統制階級，是因為一階級企圖以自己的利益，當作全體的利益。赤裸裸的這樣，實行經濟的統制，會惹起人們的反抗，尤其是在統制者占少數的時候。這裏就必要有「爲國爲民」的罩子來掩住直接的經濟支配。所以國家雖是嚴格的，直接的以經濟爲基礎，牠却是「以公權力（軍隊，警察，監獄，各種政策等）去實行經濟剝削」的「階級支配階級」的社會上層建築，是有別於經濟的「非經濟系統。」因爲階級不是永久存在，所以國家有起源也有終結；因爲支配階級不是永久屬於一個，所以國家的性

質常會變更。

在原始的社會裏，根本無所謂國家，有的祇是人們的經濟生活集團。這時候沒有什麼階級。到古代社會裏，貴族占有了一切：生產工具，生產條件，以及奴隸。這種的國家，是統制奴隸的國家。當時，這國家的統制，多半是假「上天」，「神明」的名義的。中世紀是領主統制農民的封建國家。天子受命於天，治理天下，是君主的國家。到了近代，國家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人來管理，是資本統制勞動的國家，或所謂民權的國家。然而牠的形式，卻變為多種了。

英日意等國至今還保留着皇帝；而有些國家已經採用「委員」制。不過這並不變更國家的真諦。祇要牠是以代議與憲法統治的國家，可以歸納為民權制。

在表面上，立憲的國家由人民選舉議員，規定國家律法，委託政府執行，另有獨立的司法實行一裁。所謂三權分立制。就是這種民權制。實際上卻大大不然。

歐美各國的選舉多半有財產上的限制，而且曾經有性別上的限制。這首先便使無產者失去國家中的地位。即使選舉不受限制，則無產的貧苦的人民，經濟困難，時間忙迫

，知識低微，想在選舉中與大腹便便有財有勢的資本家競爭以取得勝利，直是神話。這選舉出來的代議士組成國會，卻祇有討論，批准等權力。實際掌握所謂治理權的是政府。這政府由國會中多數派來組織，則國會中其他派系的代表祇有「曉舌」之權而已。政府雖必須向國會作報告，將行動取得國會批准，可是如果意見不合，則政府可以解散國會，將國會反對政府的權力消滅無蹤。法庭因為也是政府的系統，則所謂獨立，必須加上「」號的。所以「代議」雖是「民權」，卻是資本統治勞動的一種手段。

近來歐洲還通行一種所謂法西國家。牠是以職業團體作為選舉的基礎。政府是的指定的。職業團體中勞動是平等代表的。千百萬的工人與十百個資本家獲得同量的代表權。如果在單純代議制中，各階級在競選中，還可以舉出自己的代表，則法西選舉中，先將勞動者選舉權加以事實上的消滅，而且這選舉結果，可以由法西總機關任意修改。所以假定代議制是資本在事實上的獨裁，則法西制是資本的絕對獨裁。

還有一種所謂工人獨裁制。照主張及實行這一制度的人來說，因為工人占社會中很大的數量，而且有幾人參加選舉，所以這種統治，是一國內大多數人的統治。既大多，

數人的統治，那就無所謂階級壓迫階級。國家既屬於大多數人，則大多數人要實行自己經濟文化等等要求，就可以赤裸裸的實行，用不着任何借託的形式。他自然可以赤裸裸宣示專政；可是嚴格的說來，牠已經不是十足國家的性質。牠既不壓迫階級，當然不預備將階級永久保存下去，因此，必然的發生消滅階級的作用。這樣這種階級專政的國家，就循着無階級的方向前去。國家就帶着非國家的成份。自然這種國家是有階級性的；而且要消滅階級還得實行階級鬥爭況且如果這種專政與國家還沒有普及到全球，則牠對於他種國家，依然是處於階級對立的地位。不過這都不足以否定牠的兼有國家與非國家的特性，階級存在與階級消滅的兩重意義。矛盾要以矛盾來消滅，這本是萬有公理。國家就得以國家的形式去消滅，階級矛盾也得以階級矛盾去消滅。

如果我們要判斷國家的性質，就在這種階級的意義上去着眼。國家的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爲那一階級，則國家就是那一階級的國家，這當然不是說，某階級的國家，單純的祇謀某階級的利益而不給其他階級任何利益。爲要維持整個社會的存在起見，其他階級的利益也得注意及之。而爲爭維持統制起見必然的需要給其他階級以相當利益。所以單以局

部的政策來判斷國家的性質是很妥當的。全部的、基本的政策纔是判斷的標準。

四 政 府

執行國家統制的機關就叫做政府。如果國家是一種階級的體系，則政府也得是階級的機關。國家與政府是不可分離的東西。

在古代與中世紀的時代政府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所以稱之為專制政府。到近代，政府是根據憲法所規定的順序來產生，就叫做立憲政府。我們在研究國家問題的時候曾經說過，立憲的政府是由一定順序的選舉手續等等產生的，因為牠經過幾層轉折，雖然最初是以人民選舉做基礎，事實上卻已隔離得人民權利所能及的範圍很遠很遠。如果專制政府一切可以獨斷獨行，則立憲政府，也不難獨斷獨行。

還有一種臨時的政府，也是近代所常見的政府。這種政府多半是過渡性的。大致他的成立是由於所謂革命的結果。這種政府由革命黨人自己推定，臨時執行統制。因為這種時候，總是國家很混亂的非常時期，所以他的權力是很大的。

法西政府是個人獨裁的政府。譬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不僅事實上可以獨裁意大利，

而且在形式上他也是身兼法西黨魁，首相，內務大臣，國防局長的職司。

工人專政的政府，另有一種特點。牠除處理尋常所謂政治事務外，還管理經濟事業，他不僅將政治行為直接根據於經濟，而且將兩者都歸入管理之內。牠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立法與行政的聯合。三權分立制在表面上是爲互相牽制而設，事實上是各行其是，結果，則立法機關毫無實際權力，政府律令沒有立法意義。這立法行政聯合制，根本去除這一缺點自然這兩點是單就政府系統來說的。至於牠的本質，已經在國家一節內說過了不再重複。

根據上述情形，我們可以見到，判斷政府的性質決不能根據政府人員的社會成份而需要考察他所執行的政策。政府人員往往有一些專家，或政黨成員，譬如英國曾經有過工黨政府，德國有過社會民主黨政府，可是他們都是執行資本財團的政策並不失其爲資本性的政府。

五 戰 爭

戰爭是一種很重要的政治現象，因爲他是國家政策的延續。我們這裏所說的，不是

戰爭的軍事技術方面，因為他是軍事學的對象。我們所說的是戰爭的性質與意義。

如果國家是階級統制階級的東西這句話是不錯的話，則他決不能永久和平的渡過去。國內被統制的階級，會時時起而反抗。國家之有軍隊警察就是為此。同時，一國與一國間也會發生衝突，所以軍隊又有所謂「國防」的意義。

戰爭大概可以分為兩種，即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他們的真諦，卻不在國內與國外的分別。

本來在太古的時代，人們為了奪取生活資源的所在地，已經發生了互相廝殺的舉動。這種戰爭的意義是和直接掠取食物的爭鬥，毫無二致的。

在古代社會的時候，大奴隸王國為要增進奴隸榨取的領域，互相戰鬥。強國吞併弱國。此外因為奴隸反抗主人，又舉行了無數次的國內戰爭。中世紀的戰爭亦是同樣的意義，不過他是領主奪取剝削農人的土地，或領主與農人間的惡鬥。

到了近代，戰爭的內容比較複雜。資本的國家為了奪取市場、原料，投資地，尤其是在金融資本時代中，猛烈的進行戰爭（以擴大資本式的榨取這和從前擴大榨取的戰爭）

有同等的作用。而勞動者反抗資本也造成國內戰爭，如一八七二年的巴黎戰爭，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戰爭，一九一八年後奧德等國的內戰都是例子。

然而這時候，另有一種戰爭，所謂民族戰爭。大民族征服小民族的戰爭，固然不是進步的現象；而民族統一的戰爭卻是使經濟由零碎而變成整個。可是小民族或被統制民族之脫離大民族或宗主民族的獨立戰爭，又是進步性的時代不同，意義就不同。

在這種戰爭中，初看來似乎祇關係民族。仔細追究起來，則民族統一的戰爭，是為消滅封建的分割實行普及資本的剝削；而獨立戰爭，是脫離他國或他民族的資本剝削，結果或者是由自己來實行資本的剝削，或根本消滅剝削。這裏，不是資本家對付封建領主，便是資本家對付資本家，要不然就是資本與勞動的戰爭。說來說去，還是說到階級上面去了。

總觀上述的研究我們知道，政治現象不是天長地久存在的系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他在社會有階級的時候存在，所以他的基本規律就在乎階級的矛盾。階級矛盾究竟是「好」現象還是「壞」現象是人們所喜歡或不喜歡，這都不足以否定事實的存在。

。如果矛盾要矛盾去消滅，則這一規律的瞭解，就是這一規律運用的前提。視而不見叫做盲，聽而不聞叫做聾。學術研究，則在不盲不聾。

國際政治經濟之研究

祝百英

一 國際政治經濟——一種科學

我們已經說過，凡是一種現象，需要有系統地研究的，都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國際政治經濟」是否可以成為科學，曾經是一個問題。經過學術界長期的討論，作者認為他是應該成為一門科學的。

在現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最高階段的金融資本主義時候，資本雖是採取獨占的形式，可是他的經濟關係，已經超過了國家的範圍，而發生國際的關係。這些國際間的經濟關係，已經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經常的現象。各國相互間不僅有進出口貿易的關係，而且有放投資本的關係。一國經濟對於另一國經濟，往往是相依為命，不可分離的。這一切關係都採取各種有定的形式，而且都有一定的規律。他們或者是經濟的結合，或

者是宗主與隸屬的關係，或者是相互的衝突。這裏的各種政策手段都反映着複雜的關係。如果我們不理解國際經濟的基本規律，那就無從解決。譬如，如果我們不知道英美法德間的矛盾等我們就沒有方法明白倫敦會議的意義。

根據這些經濟關係，就形成各種國際政治關係。各種外交上的縱橫捭闔，國際聯盟，軍縮會議，以及一切其他的各種政治外交關係，都有嚴格的系統。他們很需要特殊的研

究。

如果精細些分析起來，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都可以獨自成爲一門科學。不過因爲經濟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對於初步研究國際關係的基本規律的時候，應該把他們合併研究。這樣的研究，使我們可以拿來作爲觀察國際形勢的工具。譬如我們要觀察現在歐洲的風雲，如果我們祇知道那裏各國的經濟關係是很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國際聯盟，四強公約等政治系統。

所以我們覺得國際政治經濟不僅值得有系統地作爲科學研究，而且是國際常識的一門基本科學。

二 國際關係之特質

在資本經濟發展到高度的時候，生產技術發達，規模宏大，往往一個工廠，是全社會某種商品的供給者。生產是極其「社會化」了。可是生產的占有，卻極度的獨占化了。幾個財團，往往是直接的，間接的，經過各種線索的，不僅獨占了一部門的生產，而且獨占了全國的經濟。譬如美國全國的經濟大部份都是握在摩爾根與洛基佛羅兩大財團掌中。資本的獨占與生產的社會化，是金融資本不可挽救的矛盾。社會化的生產，可以突飛猛進；可是獨占化的私有制度，祇為利潤打算，而不顧生產的發展。他甯可縮小生產而取得較多的利潤，決不願意擴張生產，而減少利潤的。

在國際關係上，情形也是如此。一國的經濟關係早已超越了國界，可是資本的占有還是限於一國的財團。一個國家裏的一個或幾個財團企圖獨占世界或許多國家的經濟。譬如英國在歐戰以前，他的獨占範圍擴展到全地球。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英國的勢力。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獨占了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汽車事業。

這裏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一國的財團，企圖依着經濟關係的擴展，獨占其他

各國的經濟。金融資本強國之所以占取殖民地，建立勢力範圍，以至與其他各國衝突，就都是由於這一個緣故。正因為有這樣雄心的國家不祇一個，世界各國就結成幾個集團互相對付，以至於開戰。而被獨占的國家往往企圖脫離這一支配，作種種獨立解放的運動。其他國家為要奪取別國的屬地，也往往造成那裏的獨立運動。這一切五花八門的國際事變，其根本原因就是民族獨占資本與民族獨占資本的衝突。明白這一特質，則國際間的糾紛就找得出條理。

二、不平均的發展

金融資本時代國際關係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各國發展的不平均。後起的國家因為可以立刻運用最新的條件，很快的發展起來，越過了先進的國家。同是金融資本的國家，有的非常強盛，有的卻很弱。

這種不平均的發展，又因資本強國壓迫弱國的舉動而加深許多國家受強國抑所壓而不能發展。譬如殖民地的經濟受宗主國强大金融資本所破壞，使全國各部門生產都陷於沒落狀態之中。我們中國工農業的破產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發展不平均的結果，使各國間的矛盾加深。本來是隸屬的國家忽然變爲競爭的對手後進的國家忽然起而爭取世界的霸權。資本的「民族化」（即上節所說的），已經使國際關係上充滿着衝突。現在又因爲不平均發展的結果，使這種衝突變本加厲，翻新花樣誰都知道在歐戰以前，執世界牛耳的是不列顛帝國，當時的德意志就與之爭霸。歐戰將德意志這一集團打倒，而美國雄起而與英國爭霸。同時在歐洲方面，卻興起了意大利，與歐洲其他各國爭霸。資本民族化與不平均發展兩者合攏起來，真有使世界各國「舊恨新愁離不了」的形勢。一切國際政治經濟現象的真相，就蘊藏在這一規律性之中。這「兩位一體」的規律，是國際現象的基本。

四 世界的基本矛盾

不平均發展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各別金融資本國家的統治有強弱的區別。就在歐洲大戰中，在金融資本最弱的一個鍊子上，資本的統治脫了節。在沙俄資本的廢墟上建立起新的社會，根本與資本主義不同，稱之爲社會主義國家。牠的成立是因爲不平均的發展，而牠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也是因爲不平均的發展。

世界經濟雖然是「打成一片」，各國的關係雖非常密切，可是許多國家還是可以維持他們經濟的獨立性。獨占經濟的國家可以支配別國；也可以脫離別國的支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並不是「非隊式」的前進，沒有前後參差的。他有前進的，有落後的。如果有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祇要他擁有相當物質條件，他是可以繼續存在的。蘇聯之所以能夠存在至今，就是因為這一緣故。

然而蘇聯這一體系，是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體系，完全不相容的體系。社會主義是在傾覆資本主義之後成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延續存在，一定是壓制社會主義的興起。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雖有衝突，可是他們對蘇聯說來，卻是「異體」了。

社會主義要能永久長存下去，祇有消滅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否則他們時時發生衝突，他隨時有受資本主義進攻的危險。資本主義必須竭力設法破壞社會主義；否則後者的潮流就會瀰漫到全世界了。

社會主義的國家竭力加緊自己的建設，以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跟着本國經濟地位的充實，他的國際地位也充實起來。他一以自己建設的榜樣啓示全世界，叫全世界勞苦

人們去學他的榜樣。因此他就成爲資本世界最大的威脅。如果他與資本主義的系統發生衝突，則全部的資本主義國家，爲了共同的敵人，會將他們自己的矛盾，在共同對付他的舉動上去找解決。譬如誰也垂涎東方的市場，在爭奪之餘，大家就會以共同進軍蘇聯分潤蘇聯市場的計劃，作爲轉移東方市場競爭的手段。又如英國曾經開過一次渥太華會議，爲了提高帝國關稅壁壘，排除外貨。然而會議結果，似乎美日等貨品還可輸入，不受意外的限制。雖然後來實施了許多方案，限制美日的勢力，可是最初似乎是無所爲而爲的樣子。其實大大不然。渥太華會議第一目的是對付蘇聯的。同樣，洛桑會議，四強公約，如果單從列強本身的關係來說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可是對於統一陣線以對付蘇聯這一意義，就很有作用了。

所以國際上重大事變，是有從這一「矛盾」去觀察的必要。

五 資本主義的矛盾

除了上述的對立之外，國際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也有種種的矛盾。自從歐戰以後，美國勃興。英美的對立就普及全球。矛盾的具體內容，就是英國企圖保持世界的主宰

權，而美國則處處向英國的勢力範圍內侵入。印度，埃及，愛爾蘭，坎拿大，一切其他地方，都有金元的「足跡」。這些地方上層分子所舉行的獨立運動，非武力抵抗運動，等等，都受美國的資助。

在東方，日美的衝突就佔了第一位。這是在英國積極助日之下發生的。美國是新侵入東方市場的分子，英日在這點上是有共同的利益，要一致驅逐這新進的分子。在中國就是實例。

在歐洲，英法的爭霸已經是很久的了。然而歐戰之後，又興了意大利。現在意德聯合，又形成一股新勢力，爭取歐洲的霸權。這一個集團是比較接近於美國的，英、法、意、德的逐，是歐洲的又一局向。英國是利用法與意德的矛盾，維持他們的均勢，以左右歐洲，一方面用以對付蘇聯，一方面用以對付美國。

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對立，即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對立。殖民地在完全獨立，或脫離甲宗主國投乙宗主國的形式下，與宗主國分裂。在前一形式之下，對資本制度發生根本的威脅。

六 國際形勢的趨向

自從歐戰停止之後，因為戰爭中極度的破壞，歐洲各國生產力都被摧殘。消費者多而生產縮小。然而美日兩國卻生產過剩。在總的形勢下，全世界還是生產過剩。這時候生產不足與過剩的國家都兩受其殃。生產不足，財富欠缺，購買力低，而外貨充斥，使本國生產更難復興。生產過剩，而市場不足，價格狂跌，企業實受其害。

這一形勢，使戰後各國，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不發生恐慌，不引起社會運動。
過後，各國暫時穩定一下。

現在世界又起恐慌。這次是工農業全世界恐慌。市場完結，購買力縮小，資本制度陷於不可救藥的地位。而強國為救自身計，只有竭力設法攻取蘇聯，分割殖民地，以一戰作最後的解決。而被掠取者也祇用自己的力量來創造自己的天地纔行。

社會問題概論

祝百英

社會雖是一個統一體，二不是什麼和諧體。他包含多種矛盾。這些矛盾表現於人們生活的不平等，及因此而引起的各種社會的病態。這是自從古代社會以來一向不斷地發生的。不過，在社會情勢進到資本主義的時候，社會的構造變為極其複雜，而社會的矛盾特別明晰。潛伏着的社會病態需要有系統的研究，作一貫的解決。因此就發生所謂社會問題的探討。自然，我們並不是說，社會問題祇存在於現代社會。社會經濟生活早就不平等，社會就一向有問題存在；不過，現代的社會問題最為複雜；而且目前有實際解決意義的，自然是這些現代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將問題祇限於這一方面。

一 民族問題

民族是比較現代的觀點。在中世紀及中世紀以前的社會中，祇有血統合的民族，或四分五裂的大小王國。要形成一個民族，需要有一定的條件。皮膚顏色相同的人們祇形成種族，而一個種族的人民可以分成許多的民族。白族人是一個種族，可是牠們分為英

吉利，法蘭西等民族。人種也不是民族。現代意大利民族是包括羅馬人，日耳曼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等結合而成的。至於一個國家，更不能當作等於一個民族看待。我們中國就是由漢滿蒙回藏苗猺獞等民族合而成的。

族民首先應該是經濟上互相溝通的人民所形成的。雞犬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們，絕對形成不了一个民族。英吉利和北美洲，雖是同屬於盎格魯撒克遜種，卻因沒有經濟上的這種互相溝通的結合，就分成兩個民族。

然而偶然的，經濟生活中不佔基本重要地位的溝通，並不就造成一種民族。民族必須是有歷史性的經常聯系才能造成。古代波斯聖拉斯王的國家，或麥開童尼亞歷山大王的大王國，是由歷史上相異的人種形成的。可是牠們祇是一種偶然的會合，不能形成一個民族。所以，民族是歷史的產品。

民族既然是這樣經濟與歷史的產品，那牠一定有共通為語言；因為在經濟上密切的連結，而經過長在一起的歷史，自然產生了共同的語言。所謂共同的語言，自然並不除去方言上相當的區別。沒有這種言語的相同，就不能造成一個民族。日本的本部與朝鮮

，歐洲大戰前奧國本部與捷克，舊俄羅斯與波蘭，他們都各自有各自的言語，根本就合不成一個民族，而是兩個民族。

如果言語相同，而住居於不同的地域，那也不能算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即使他們從前屬於一個民族的，因為地域的隔離，也已經分裂為兩個民族了。挪威人和丹麥人，講的是同樣的言語；英吉利人與愛爾蘭人講的是同樣的言語，可是住於不同的區域，形成不同的民族。英吉利人和北美洲人，從前居住於同一的英倫，形成單一的民族。後來，人們發見新大陸，英倫人民移住美洲，經過經濟上長期發展的歷史，另立一個民族了。猶太人本來是共同住在一個地域的，是一個民族。後來地域失去，雖保持着希伯來的言語，也不成其為一個民族。而且因為地理上的分隔，又反應到言語方面。英吉利語與北美洲語，終久漸次表示不同；而希伯來語在猶太人中間，漸漸沒有人知道。

根據於這樣有經常經濟結合，共同言語，常住在同一地域，而經過長期歷史而形成的人民集團，自然形成共同的文化及其所發生的共通的心理與能力或所謂「性格」。因此，共同的「性格」與文化也是民族的又一特性。

有這樣的五個條件，纔形成一個民族。要有這五個特點，就不是細小的民族社會所能彀，也不是四分五裂的大小王國侯領所能造成。這祇是近代資本經濟的產品。

在資本主義經濟初興的時候，因為封建制度的大小王國侯領的分割領土所造成的分裂現象，阻礙經濟的擴展，有資者就開始所謂民族統一的運動。當時統一民族的口號，就是「一個民族，一個政府，一個法律」。資本經濟因為市場的要求，需要廣大地域所居住的人們，結合在一個國家範圍之內，由一政府與一個法律所統治。他是反對封建的分割，反對他國的壓迫。譬如一七八九年法蘭西革命的時候，革命戰爭一方面反對封建的制度，另一方面就是反對當時法國周圍民族的壓迫。在當時革命軍軍隊旗幟上，書寫着「海洋的自由，一切民族的同權」。這一方面是反對英國在海上的霸勢，另一面是反對封建大王國的支配。意大利受奧地利王國的壓迫，而國內分裂為許多諸侯國，也曾經興起一番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

這種「民族同權」「民族統一」的運動，是歷史上進步的運動。然而牠是資本主義性的，牠是以資本階級的利益做出發點，將他的利益當作全民的利益。資本市場的統

一，就是他的基礎。所以他並不是根本消滅壓迫，而是資本的壓迫替代封建的壓迫。從「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一標語上就可以看到他是企圖將不同的民族，強制的裝在一個國家之內。如果從前是大王國壓迫小王國，則在近代資本國家內，依然還有以大民族同化小民族的形式，壓制小民族。舊俄羅斯壓迫波蘭，烏克蘭等等就是實例。

這種國家主義的民族政策，再繼續下去，就造成很不進步，很反動的形勢。近代的資產者時常以民族利益相號召，以壓制勞動者就是顯著的例子。而且這種國家主義，還利用之作爲對外的政策。俄羅斯爲要和支配巴爾幹的土耳其相爭競，就高唱泛斯拉夫主義，「一切斯拉夫人都是兄弟們」，而叫無冤無仇的農人們在戰場上去互相廝殺。德意志也曾濟稱奧地利，匈牙利及其他歐洲各國中德國產的人們爲「兄弟」，企圖征服歐洲。門羅主義就是美國想支配全美洲的主義。亞細亞人的亞細亞，就是叫中國，印度等地方都受日本支配。

這種民族的壓迫，到金融資本時候，更其嚴重，而採取宗主國壓迫殖民地的情式。在金融資本時候，經濟的範圍是越過了國家界線，擴張成國際的範圍。可是這並不造成

各民族在經濟上及其他方面平等的發展，而是造成所謂經濟先進的國家支配經濟落後國家的形勢。

宗主國用屠殺，驅逐，殖民的方法，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取得他所需要市場與原料，並且榨高度的利潤。他以「西洋」文化進步的藉口，硬叫經濟落後的國家，以尊重「新文明」的名義。尊重金融資本的大國，直接受他的支配。為了要達到這一目的，他連絡殖民地中的舊勢力，以維持他的支配權。在嚴重的時候，他不惜用武裝的力量轟炸殖民地。將血腥的高度利潤收回本國，拋出一些殘餘，擲給一部份高貴的勞動者，哄騙他們去贊助這種殘酷的掠奪。所以宗主國雖在殖民地擴張了他金融的勢力，卻限制殖民地上經濟真正一往直前的發展。在這個時代，民族的壓迫，採取雙重的狀態。宗主國之內，大民族壓迫小民族，而宗主國又壓迫殖民地國家。經過殖民地國家的國內統治者，殖民地中的大民族，又壓迫他的小民族。宗主國不是由一個民族所形成，殖民地也不見得都是由一個民族所形成。這民族解放的運動，就和從前民族統一運動根本不同了。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利益，宗主國與殖民地中所謂小民族獨立運動的利益，是相一致的；而

的利益，又是與勞動者反對資產者，工具反對地主資本家的利益一致的。舊統制的消滅，與民族壓迫的消滅，是一個運動的兩面。所以民族解放運動，是人類解放運動的一面。民族祇有在舊制度的毀滅中才得解決。

因此，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真諦，應該是去除一切形式的民族壓迫，讓各民族絕對自由的決定他的獨立解放，以至於將一國家分成幾個國家，也不應該反對。如果，民族間結合同盟，那必須是出於絕對的自願。在曾經壓迫過小民族的大民族方面，對於小民族的獨立解放行為，絕對不能採取一點限制的行動。任何的「泛民族」主義，不論在政治上，文化上，任何方面，都不能提倡；凡是帶有壓迫性質的措施，一點也不能採取。在被壓迫的民族方面，在獨立解放運動上，自然要儘可能的使每個民族單位不要弄成四分五裂。

二 勞動問題

可是，在資本經濟之下，不僅沒有把民族的壓迫去除，反而加重，而且社會內部的矛盾，也並沒有掃除，反變成尖銳。一無所有（祇有勞動力）的勞動者受資產者所發

取與壓迫，替代了私有小生產工具的手工農業者之受領主們的壓迫。社會經濟生活的不平等比較從前還要厲害。勞動的運動就此發生。英國的憲章運動，國際工人聯合運動，法蘭西第二帝國時代的工人運動，巴黎公社是資本主義上半期中幾個重要的勞工運動。這裏，初步的運動，至少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工作制度問題，另一方面是關於工廠制度問題。

在工作制度方面，首先就是工資問題。根據經濟學上的分析，我們知道：這工資與利潤是成反比例的。勞動者為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就得增加工資。企業家是不同意的。工資的鬥爭是勞資雙方爭執的焦點之一。工作時間是爭執的另一個焦點。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最初的時候，工作多是延長到十多小時，將近二十小時一天。飲食等事情往往不給與休息的間隙。後來，有些國家局部的實行了每天八小時的工作。這是由於勞動者為「八小時勞動，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教育」而鬥爭所得的結果。可是這並不普遍。現在世界上，祇有一個俄國實行七小時工作制，其中重難危險的工作，還減至六小時，以至四小時。近來美國因為經濟不景氣，生產過剩，許多企業不得不停閉，而開工作的企業

就實行所謂每星期不過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制；而羅斯福現在且高唱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不過，這並不是勞工的利益而減工，因為工資是照鐘點計算的，即使每點鐘的工資不減少，而勞工們每週的收入已大大減少了；況且每點鐘的工資是減少了，貨幣又跌價了，因此，使實際工資更為減少。

休息時間又是勞工問題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通常，星期日或紀念日能夠放假，已經是優越的條件了。勞動者整年的工作，很少有比較長期休息的機會。

其實，在現在這樣高度的生產力之下，勞動者每天工作七小時，是很足以推進整個社會經濟的了。工作之外，他們應當除獲得延續生命的最低限度休息外，有充分休息，遊戲，娛樂，教育，發展文化，享受一切現代文明的創造品之機會。這裏，就需要充分的空閑時間，又需要高額的工資。勞動者是社會上最勞苦的人們，他們應當取得社會中最高的報酬。

然而，資本經濟的發展，不以他們的利益為基礎。資本式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不減少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卻將許多勞動者拋出企業之外，形成失業。資本經濟的景氣

與恐慌的輪迴，使失業成爲常態。失業者並不是他們自己不願意作工，而是社會上排斥他們的勞力。不作工不得工資，失業者就活該餓死。經過勞動者長期的苦鬥，有些國家內，成立了所謂失業津貼，或施行一些慈善事業性的救濟。不過，這是很不普遍的。而且受嚴格條件所限制。因此，貧困就成爲社會普遍的現象。乞丐，娼妓，流氓，盜匪，就愈趨愈多。人們充當乞丐，騙子，娼妓，流氓，罵他們殘酷，骯髒，加以種種的懲罰。然而人們不知道，這就是現代社會本身所製造出來的成績。長的失業迫使他們去過游蕩的生活，因此就不得不做這些行當。而這種不經常的生活自然要產生種種「不良」的心理與意識。如果不根本改造社會，這些現象是要永遠存在的。

在工廠制度方面，也一樣的發生利害矛盾的問題。工廠的一切衛生設備：空氣，溫度，光線，溼氣，清潔，對於勞動者工作中的健康，發生很大的影響。近代工廠中很少能夠在這方面設備周到的。

此外，工作中還會發生種種的危險，和機器傷身等。近代國內，有些地方，對於這種危險，舉辦有些所謂勞動保險。

童工女工的問題，是勞動問題中的又一問題。因為機器的發展，使工作輕巧，幼弱的婦女兒童都可作工。又因為她們的懦弱可欺，而被廣泛的採用。婦女在生育上應有的休養，兒童在十八歲以下應有的教育與生理的發育，都被阻止。

這許多勞動問題，在近代社會中，往往以各種法律或社會的習慣施行種種的所謂社會政策，將勞動條件稍稍改良一下。然而，在資本家以謀取利潤為目的的社會中，決不能根本改善勞動生活的。祇要消滅這一制度，另立一個新制度，那勞動者會得真正的解決，纔能取得確實的利益。

二 農 民 問 題

在世界上統治着資本的時代，中世紀的土地關係，卻並沒有消除淨盡。在任何國家，土地占有任何形式，還是存在。農民在經濟生活中就成為很重要的分子。因為他們是既受資本的壓迫，又受土地主人的壓迫，他們的出路就是社會中很重大的問題。尤其是在農民在社會中占很大數量，小農業國經濟中占很重要地位的國家中，農民問題解決，是社會改造中重要的一鍊。譬如，在殖民地解放運動中，半經濟落後國家的社會改造運動

中，取得農民中基本部份的同盟，還用各種策略以取得農民的擁護，是整個運動決生死的關鍵。農民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勝利。

可是要解決農民問題，首先需要解決土地問題。人們必須使土地能夠給農民自由的使用，而且給每個農戶有平均自由進行小農業並且取得充分資金的可能纔行。

在土地關係變更了之後，進一步就得需要改造農業經濟的形式。在最初，小農經濟固然會延續相當時期，然而，逐漸的，必須使小農經濟結合起來，形成集合的大農莊。而且我們還得設法建立新的大農莊。這裏自然需要準備很大的技術基礎。因為澈底的機器化，纔是根本改造農業的最後辦法。

在這樣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民取得更高的收益的條件下，纔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正確的方針。改變土地關係，使農民在舊有的小經營下，取得較多的進益，而大農莊化（集合的或國營的），使農民有無窮發展的前途，以改造他們生活，提高他們的文化，增進他們的享樂，因為生產率的提高，使他們有這種的時間與經濟上的必要條件。

四 婦女問題

婦女因為受幾千百年歷史性的各種壓迫，使她們在一切方面都處於很惡劣的地位。

在資本經濟初興的時候，早就提出了婦女問題。盧梭的男女自由平等，是解放婦女的第一聲。法蘭西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也對於婦女問題，有很大的作用。一七八九年八月五日，巴黎婦女團「進軍」到凡爾賽，就是揭破了當時男女不平等的事實。就在這時候，婦女參政問題，作事實上的提出。後來英國婦女問題專家伏爾斯頓克拉夫，提倡男女婚姻平等的主張，作為解放婦女的一條道路。

然而，自從資本經濟發展以來，婦女並不過到較優的生活，而是過着更惡劣的生活，工廠中的婦女勞動，使勞動者家庭破碎，婦女除依舊不能放棄家務瑣事的負擔外，還做了勞動的奴隸，如果從前婦女不是等於玩物，便是等於家婢，到現在又加一層勞動的奴隸了。

為了解放婦女，就發生種種的運動，總括起來，可以分為下列三種。

第一是所謂宗教的婦女運動，如教堂，寺院，青年會等等。這種運動是利用富貴婦女的所謂慈善心，取得一些經濟上，文化上平等的可能，對窮苦的婦女稍為加以一些施

捨。這種運動不僅不足以普遍的解決婦女的困難，而且是迷惑婦女，使她們完全失去爲自己利益奮鬥的決心。牠在她們眼前，造成一種可怕的幻想，證明富貴婦人是樂善好施的救主，幸福祇有在今世忍辱茹苦之後到來世或天堂上可得到。牠將「富貴者」剝削「貧困者」的事實掩去，將從貧苦的她們身上括去的血汗由富貴的他們窮奢極侈的享樂之餘所吐下來的一點唾沫，回「施」給貧苦的他們，還叫他們去感激，去贊頌。

提倡女權運動是婦女運動的另一種形式。在這方面，人們主張教育平等，職業開放，女子參政，婦女經濟生活獨立。抽象的從運動的表面看去，是很合理的。不過直到現在，在資本統治的國家中，由於這類運動的結果，婦女所得到的權利，是微乎其微。

愛倫凱就反過來索性提倡母權主義，他說：「對於國民最要緊的，不是婦女乃是母親」。婦女向來是一架生育兒童的機器，經過愛倫凱這一主張，就將生育機器的命運，千古注定。但是養育兒童，是社會延續問題，不是個人的嗣續問題。這「母親」的責任，就不該是個別婦女的責任，而應該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如果倣照愛倫凱的邏輯，則「對於國民最要緊的，不是男子乃是父親」，這父親就得解作「賺錢維持一家」的男子。

家庭就變成「鑄幣機」與「造兒機」，結合了。這不是解放婦女，而是沒落婦女，使婦女永世沉沒於家庭。

其實，資本社會所自豪的一夫一妻，祇不過是半斤對八兩，商品等價的賣買的反映而已，然而商品交換的中間——貨幣，是可以交換到一切的商品，則婚，姻關係的中心所謂「愛」與「肉」，也就隨「市價」而賣買，姘夫姘婦，就陪襯着一夫一妻的現象而盛行，合成現代的一個男女關係。婚姻自由與離婚自由，在這種條件之下，除他的有利方面外，就格外增進婦女的痛苦。

要真正解放婦女，首先得從數千年羈壓的「家婢」生活中解放出來。這並是像資本會中婦女勞動之破壞家庭的作用那樣，可是也不是使婦女回到什麼溫和的家庭生活而是使他們脫離洗衣，燒飯，哺小孩等最容易消磨智力體力的生活。公共飯廳，洗衣所，育兒所，是解放婦女的前提。祇有這樣，他們纔能在時間上與空間上，有參加社會建設，提高本身文化的可能。同時，他們必須獲得經濟的條件，使他們能夠獨立實現這一可能。譬如結婚離婚的自由，祇會使婦女痛苦，如果他沒有取得經濟上的到可能以維持他及

其嬰孩的生活。參政、教育等等，更其用不着說了。爲要實現男女真正的平等，補救婦女由歷史所造成弱點起見，社會上還得與他們以種種的超越條件。這種超越的條件不論在形式上與實質上，都超出「重慶護坐」一千百萬倍以上。

五 教育問題

資本社會，也曾經要求過所謂公民的教育。機器生產的發展，需要各種有科學智識的專門家，又需要有初淺常識的勞動。不懂起碼的算術是不能在機器旁邊工作的；不識字的人是不會循着技術指示以進行工作。計算與專門技術，以及一切的學術，都變成資本利益的必須品，成爲賣買的商品。

在現代社會上，科學雖是發達，卻完全如商品；識字的人雖比從前增加，教育卻是個人主義的。資本的利益，要各種科學，而教育却要金錢買得的，因爲知識可以出賣。知識並不是爲着提高人類的文化，而是助長資本的利慾。因此教育就完全爲了達到個人利益的目的。拜金主義的學術，個人主義的意識，是現代文化教育的真相。

在另一方面，教育變成一種裝飾品，富貴的門第，需要博士碩士的銜頭去提高他的

聲價；而博士碩士的取得，又在人們在社會上進身之階。則資本進展到金融資本時代，社會經濟一般的昇不在發展。技術與學術同遭停頓。智識者就表現人浮於事；真正的學術，反變爲社會統治的「障礙」。如果在中世紀時代，自然科學遭受宗教的壓迫，科學家受帝王的殺戮；則現代的科學，就受金融魔力的。教育與學術，愈成其爲虛偽空洞的裝潢品。美國大學的博士論文，就可用「洗盆法」來充數。

要澈底解決教育與學術問題，那就得有實行真正的普及教育及自由發展學術的制度。現在學校的門雖是大開着，但有什九的人走不進去。學術雖然有人提倡，但沒有實現的可能。學校爲改良教育而增加學費，限制招生，使兒童與青年更缺少求學的機會；最高學府爲提倡學術而取消社會科學，使人們對於社會情形更變成瞎子。

普及教育與提倡學術如果真要實行，那就先應確立經濟的條件。一切研究學術的人，材料等設備，必須「不惜工本」而置備，應有盡有。學理的研究須不受任何的干涉。學校不僅應當設備周全，而且決沒有徵收學費的辦法。教育兒童，教育青年，並不是一個家庭的負擔，而是爲社會造成有用的職員，應該由整個社會負擔。免費教育以及津貼受

教育者個人及其家庭的費用，纔能使教育真正的普及，因為祇有這樣，則人人可以進學校，學校可以完全依照各人的材幹，收納學生，給以適當的訓練。同時，公民最低限度的教育也可以強迫的普遍施行。因為這樣受教育對於個人及家庭已經不是任何形式的累贅了。

有了這一條件，則教育與學術就可以走上與社會有益的途上。為去除這方面一切的空虛與無用，牠必須以社會性與生產性為原則。教育的內容應該是以消滅社會上惡勢力惡系統，建立新生活為題材。迷信，錯誤的思想，惡劣的風俗習慣，應當是教育攻擊的對象。新技能，新學術，新社會生活的建設，家庭的改造，應當是訓練青年的目標。所以學校不僅不應隔離社會，卻要深入社會之中；學校並不要抽象的清高，而應當與實際經濟生活連結。工程學生應與工廠一體；政治學校應與機關相連。上海的吳淞，江灣，真如，決不是設立學校的地方，然而這並不是叫學校與「大世界」混合，叫學生沉迷於腐化，而是要他們確切瞭解實際生活，向之作不妥協的鬥爭與改造。用句譬喻的話來說，在上海大世界對門設立一個學校，務必使「大世界」化為「健身房」才行。

因此，教育決不是校門以內的事情。一切博物館，陳列所，娛樂場，體育場，戲院，圖書館，閱報所，壁角，牆上，書報，雜誌，故事，休息處，一切地方，一切東西都得充滿着教育的資料。不僅「學校重地，間人莫入」的虎頭牌是罪惡，而且「非家長說明，不得出校」也是罪惡。教育的系統，要變成整個社會上的系統。通盤的計劃，佈戰陣般的配置各種上述機關，是必不可少的。這樣偉大的教育文化建設，談何容易，做卻不難。這祇要根據任何國家的現有基礎都可以逐步做去，以至於成功的。這裏祇要「一個」由經濟構造變革所造成的財政構造上的變更的「單純」條件，就足夠了。

社會問題，種類本是很多，基本的可以說就是這五個。根據上述的研究，很清楚的見到，這些問題目前在世界各國都需解決。一切已有的局部改良方案並不能解決問題。社會構造上的變更纔是治本的方法。而這治本的方法究竟要以什麼治標的方法做前提，這是下一講所應得講的問題。